

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

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 ○ 解说摘录 ○ 壹 ○ 美国学者任达 Douglas R. Reynolds 的新政革命与日本 The Xinh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一九九三 李仲贤

的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一本书出版以后引起不小的争议包括本人在内对其观念和材料方面的种种局限议论较多 不过作者指出了以下的重要事实即新政前后的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截然两分此前为一套系统大致延续了千余年此后为一套系统经过逐步的变动调整一直延续至今 作者这样来表述他的看法 ○ 在一八九八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 仅仅十二年后到了一九一零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最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 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士绅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藉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和制度 如果把一九一零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一九二五年的以至今天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 另一方面如果把一九一零年和一八九八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 ○ 也就是说中国人百年以来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与此前的几乎完全两样这一天翻地覆的巨大不过是百年前形成基本框架并一直运行到现在 今日中国人并非生活在二千年一以贯之的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来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大变

赵建国著

分解与重构：清季民初的报界团体



动所形成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的制约之下 任达认为这样的变动是以清政府和各级官绅为主导的具有根本性的革命并且强调在此过程中日本影响的主动与积极一面 对于诸如此类的看法意见当然难免一律表达意见十分正常 但任达所陈述的知识与制度根本转变的事实却是显而易见不宜轻易否定的 ○ 不过这一转型的过程及其意义远比任达所描绘的更为复杂和深刻 因为它不仅涉及明治日本还包括整个丰富多样的西方不不仅发生在新政时期而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不仅政府主导的那些领域出现了制度变化全社会各个层面的各种制度体系几乎全都根本改观参与其事者不仅是清朝官绅和日本顾问外国人和中国知识人也大都介入其中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革命性变动不是单纯移植外国的知识与制度今天中国人所存在于其中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虽然来源多在外国因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大体相似但还是有许多并非小异 这些千差万别不能简单地用实际上未能摆脱贫化的现代化理论来衡量和解释 ○ 今日中国人在正式场合用来表达其思维的一整套语汇和概念形成近代中国思想历史的各种学说教学研究的学科分类总之由人们思维发生独立于人们思维而制约着人们思维的知识系统与一个世纪以前中国人所拥有的那一套大相径庭 如果放弃这些语汇概念和理解把握也很难真正做到了解同情 近年来学人所批评的倒放电影和所主张的去熟悉化显然都由此而生

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

桑 兵 主编

赵建国 著

分解与重构：清季民初的报界团体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Copyright ©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字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分解与重构：清季民初的报界团体 / 赵建国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7
(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
ISBN 978 - 7 - 108 - 02934 - 8

I . 分… II . 赵… III . 报刊－新闻事业史－中国－1905～
1921 IV . G219.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5624 号

责任编辑 曾 诚

装帧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125

字 数 218 千字

印 数 0,001 - 5,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绪 论 _____ 1

 一 选题 _____ 1

 二 学术史 _____ 4

第一章 报界团体的初建：1905—1910 _____ 15

 第一节 早期报人职业意识的演变 _____ 15

 第二节 团体发轫 _____ 43

 第三节 抵制报律 _____ 63

 第四节 交往与联系 _____ 80

第二章 从区域联合到全国联合：1910—1913 _____ 97

 第一节 全国联合 _____ 97

 第二节 黄金时代 _____ 125

第三章 艰难中的奋进：1913—1916 _____ 168

 第一节 厄运及抗争 _____ 168

 第二节 内外联络 _____ 206

第四章 复苏与生机：1916—1921 _____ 228

 第一节 团体涌现 _____ 228

2 分解与重构

第二节 全国报界联合会	246
第三节 中外交流	278
结语	295
后记	308
征引文献	310
索引	315

绪 论

一 选题

中国近代报刊源于西学东渐，来华传教士创办的近代中文报刊直接刺激了民族报业的兴起和报人群体的产生。早在 1902 年，梁启超就确认“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1]是影响中国前途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以后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2]的评语。但就实际而言，新式报业诞生之初，规模和影响相当有限，其从业人员处境尴尬。至 1905 年前后，报业的数量增长和社会影响明显改观，报界同仁开始倡导并组建团体，使之成为一种强有力的集体表达方式。借助结社和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等有组织行为，报界提升了在地方乃至全国的社会地位，走出边缘境地，并与政、商、绅、学各界建立密切联系，引导社会风尚。

[1]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丛报》，1902 年 10 月 2 日。

[2]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庸言》第 1 卷第 1 号，1912 年 12 月 1 日。

2 分解与重构

和民情好恶,言行举止足以反映多数人的意趣,在清末民初社会政治大舞台上扮演举足轻重的显要角色。报界群体的形成和角色凸显,展示了新兴群体的社会生长历程,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但学术界对报界群体的崛起与结社活动却知之甚少。以往研究对官、绅、商、学等社会群体关注较多,报界的结社和团体活动无论是在历史学界,还是在新闻学界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关研究非常有限,且大都语焉不详。致使这一重要领域未受关注的原因,首在资料不足,各种资料汇编鲜有涉及报界团体的相关文献,有关资料散见于各类报刊、回忆录、笔记,搜集难度较大。其次,晚清民初各地报业发展极不均衡,而报刊有官办与民办之分,民办报刊因党派杂糅其间,少有经济独立者,这必然导致报馆各方面的依赖性。报业从业人员又有编辑、记者、职员之别,内部差异性显著,彼此的共同性反而容易被人忽视。从整体上考察报界的结社及团体活动的关系,不易把握。其三,受报业自身状况及其所处社会历史环境的局限,近代报刊大多难以长期维持。在此制约下,报界团体聚散不定,时起时伏,很难有统一的连续性社团存在,各区域性报界团体则纷纭复杂,规模大小不一,彼此看似缺乏联系性,造成了研究的困难。

研究的难度预示着该课题具有的挑战和学术价值。本书拟在充分掌握前人相关研究和用力搜集各类史料的基础上,以近代中国报界群体意识的自觉为基本线索,按照时间与逻辑顺序,细致描述 1905 至 1921 年报界团体的组织发展及其活动,考察报界群体的形成、自觉、内部再分化以及成为国民有机部分的阶段性变化,进而拓展学术界对近代中国新兴社会群体的研究。

毋庸讳言,报界群体意识的自觉很难从单个报人或报界代言人的言行来加以判断,其历史发展的轨迹可由报界团体组织的演变及活动体现或反映出来。报界由最初的区域联合走向全国性联合,各类报界团体宗旨的演进及其共同维护言论自由、报界公益的种种举措,与境外同业交流合作的渐次拓展等,均能表现报界群体意识自觉的发展变化。为此,考察报界的结社和团体活动,是把握和理解报界群体意识自觉历史进程的重要途径。

报界团体不仅维护报界权益,推进报业发展,且强化报馆监督政府、指导社会的职能和作用,在政治与社会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可视为清末民初民间社会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报界的群体自觉与结社活动,牵涉新兴职业社团与国家政权的相互制约关系。这在各类报律所引发的言论自由运动中反映特别突出。

处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变动中,报界的结社和群体意识自觉进程也涉及近代中国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的重构。报界以团体组织形式凝聚结合,表达利益诉求,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提升报界地位,使之由边缘向中心迈进,进一步冲击传统社会秩序的平衡,加速旧群体的分化,有力推动了社会群体结构的重组和社会关系模式的制度性变迁。

此外,这一进程还为观测近代中国社会群体意识的萌生及演变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事实上,报界群体意识自觉不仅与报业发展关系密切,而且主要是在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刺激下生长发育,经历了由完全自发到逐步自觉、走向成熟的脉络清晰的历史过程。伴随群体自觉的发展,报界与其他社群相互依存契合,建构出统一的国民,成为四民社会向国民国家转化的重要一环。

本书以 1905 — 1921 年为考察范围,缘由在于: 1905 年上海《时报》首倡组建“记者同盟会”,得到普遍响应。此后,各区域性报界社团相继问世。1910 年,中国报界俱进会正式成立,它名义上是第一个全国性报界团体,实际范围只限于报馆,相当多的从业单位和个人并未包括在内。直到 1919 年全国报界联合会成立,报界联合才趋于完善,成员由最初的中国人自办报馆(主要是日报)发展到国内的所有报馆、杂志社、通信社以及中国人在国外所办的报馆、杂志社、通信社,甚至还用名誉会员的名义吸收外国人在中国所办的报馆、杂志社、通信社,几乎涵盖了业界所有的机构和个人。1921 年,全国报界联合会由于报界内部的矛盾而分崩离析,但中国报界于是年联合派出颇具规模的代表团出席第二届世界报界大会,成为对外联络与交往的新起点,显示了报界重新联合的必要与可能。从 1905 年到 1921 年,报界团体组织的发展和报界群体意识的自觉相辅相成,从无到有,由局部而整体,呈现出较为完整的发展脉络,可以视为相对独立的重要阶段。

二 学术史

温故而知新,认真梳理与仔细研习先行研究成果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和前提,在此基础上方能把握前进的方向,继而有所创获。起初从事清末民初报界团体与活动这一课题研究的,主要是新闻学专业的学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史研究,发轫于民国时期,后因各种原因,跌入低谷。1978 年后,新闻事业史研究迅速得到恢复与

发展,取得丰硕成果。与此同时,近代史学界关于清末民初社会、政治、文化的研究也全面展开,对近代新闻事业史研究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在既有研究中,关于报纸、报人及其新闻思想、新闻法等问题的论著占绝大部分,形成主导,对于报界结社和团体活动的研究极为薄弱。下面就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回顾,以显示在这一领域前人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可以扩展的空间。

1. 民国时期

1917年,姚公鹤于《东方杂志》第14卷第6、7、12号发表的《上海报纸小史》,是我国最早的新闻事业史专著,初步涉及报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上海报界团体等问题。作者意识到报界团体对报业发展的重要性,指出报界公会为“一报界大问题”,并认为上海报界公会以上海各日报社为限,没有实现报界内部的团结,“除每月勉力供给月费外,实亦无所事事”。上海报界不能团结的原因,姚公鹤认为在于“各报无共同利害”,“各报设立之宗旨,已各有其独到之处,或竟不以营业之得失为衡”。^[1]

时隔十年之久,1927年11月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面世,被誉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该书专有一节论及报界团体,简要介绍了中国报界俱进会和全国报界联合会的发起、成立与消亡过程,对这两个全国性报界团体的章程和议案有较为全面的记载。戈氏把报界团体组织分为报馆公会与记者公会两类,认为上海日报公会为“我国报界有团体之始”,详细叙述了上海日报公会与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的章程。此外,戈公振介绍了中国

[1] 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东方杂志》第14卷第6号,1917年7月15日。

6 分解与重构

报界参与世界报界大会的情况,指明 1921 年世界报界大会开第二次大会时,我国始派代表与会。^[1]由于成书较早,又系通论,该书对相关问题的叙述略显简单,但对后来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影响深远,此后学者在论述报界团体问题时,多援用戈说,其中不免有以讹传讹之处。

继而,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渐成规模。1930 年,黄天鹏在其所著的《中国新闻事业》一书中,专门讨论报界团体。他在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的基础上,对中国报界俱进会及全国报界联合会的议案作了重点介绍,对两个组织的演变也有概括性描述,并详细述及万国报界大会的会议要案与 1927 年湖南新闻联合会的议案。^[2]同年,项士元所著的《浙江新闻史》一书,用较多的篇幅论述 1928 年成立的杭州记者联合会,对前此的上海日报公会、世界报界大会、中国报界俱进会、全国报界联合会也依承戈公振书简明扼要地提及。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项氏对报馆联合与记者联合作了明确区分,指出:“合一省或一市一县之记者团体,当以光绪末年上海日报公会为最早,此实为我国报界有团体之始,然系以报馆为单位,不足以语广义之新闻团体。及民国十三年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成立,上海记者始有较大之集团。”^[3]胡道静于 1935 年出版的《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着重讨论上海日报公会的成立情况,指出:“上海日报公会的组织始于一九〇

[1]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 1955 年,第 297 页。

[2] 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民国丛书》(三编)第 41 辑,上海书店 1991 年,第 128 页。

[3] 项士元:《浙江新闻史》(下册),之江日报社 1930 年,第 290 页。按: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的成立时间实为 1921 年 11 月。

九年（宣统元年），其动机是因为《神州日报》以登载印度巡捕违法事为工部局所控告，各报不平，起而组织公会，为之后盾。当公廨审讯时，除《神州日报》自聘律师辩护外，日报公会亦公请律师代为申理。从此上海的报馆就有了一个公共的组织。”^[1]此说后来引起不少异议。另外，胡道静对中国报界俱进会的成立和报界俱进会的特别大会、全国报界联合会的成立和三次会议略有提及。

与此同时，部分新闻理论著作间或提及报界团体问题。1932年，张静庐所著的《中国新闻记者与新闻纸》对新闻记者的组合作了有理有据的讨论，重心在于阐述“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的成立及原因。张氏进一步认识到报馆所组织的团体与记者所组织的团体之间的分野，认为“民国十年所组织的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为全国新闻记者的组合的嚆矢”，是“中国新闻记者的自觉的表现”。^[2]

除关于新闻事业史的专著之外，30—40年代新闻界主办的一些专业性杂志所刊载的部分回忆性文章与学术性论文，对清末民初报界联合也有所涉及。如刊于《新闻学刊》第1卷第2期的《新闻界名人传略》一文指出，上海新闻团体的组织，起初主要出于抵制外国人操纵我国新闻事业的需要，而忽略了内部的团结，后戈公振等人倡议组织新闻演讲会，以谋报界的发展。^[3]吴贯因的《余之办报经历谈》一文亦提及1921年的世界报界大会及我

[1] 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民国丛书》（二编）第49辑，上海书店1990年，第31页。

[2] 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现代书局1932年，第75页。

[3] 《新闻界名人传略》，《新闻学刊》，第1卷第2期。

国报界代表王伯衡的参与情况。^[1]

民国时期,报界团体及报界联合问题已经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且时有较精辟的论述。整体上看,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研究水准,后来者大都援引戈说,进展不大明显。

2. 1949 年以后

1950—1978 年的近 30 年中,中国大陆的新闻事业史研究陷入停顿。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的新闻事业史研究继续有所进步。曾虚白于 1966 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史》颇有代表性,此书侧重叙述了报界团体对新闻教育的贡献,指出我国新闻教育的萌芽源于 1912 年中国报界俱进会的倡议。^[2]其关于全国报界联合会的论述基本上沿用前人成说。1974 年,朱传誉的《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一书在全面继承与吸收前人有关成果的基础上,拓宽清末民初报律研究的范围和深度,介绍了当时一些报纸和北京报界对报律内容的批评,以及北京报界公会在报律实施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抵制措施,^[3]为后人认识北京报界公会的性质、了解北京报界公会的活动提供了线索。

1978 年以后,大陆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近代报纸、新闻思想、报人成为研究主题。相比之下,对报界团体组织的研究显得不足,有关讨论多见于通史和通史性质之史书。马光仁的《我国早期的新闻界团体》一文,是不多见的以报

[1] 吴贯因:《余之办报经历谈》,《新闻学刊》第 1 卷第 3 期。

[2] 曾虚白:《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 1966 年,第 674 页。

[3] 朱传誉:《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台北:正中书局 1974 年。

界团体为主要对象的专题研究论文。作者对报界团体的倡议者、全国性报界团体的创建、天津报馆俱乐部的建立、其他各地报界团体的组建,以及报界团体为言论自由而斗争的历史进行了概述。此外,马光仁还重新考定上海日报公会成立时间,对前说提出异议,认为上海日报公会应在《神州日报》事件之前成立,时间为1909年3月28日,由《神州日报》、《时报》、《申报》、《新闻报》等联合创建。上海日报公会成立后不久,即发生公共租界印度巡捕侮辱中国女子事件,《神州日报》对此做了大量报道,工部局以《神州日报》“妨碍治安,扰乱人心”的罪名向公审公堂提出诉讼,引起上海各华人报纸的不满。7月13日开庭审讯时,除《神州日报》聘请了律师辩护外,上海日报公会也延请律师代为申诉。^[1]

一部分通史编撰者着手修订前人的误识。1988年,王洪祥主编的《中国新闻史》一书指出:“1910年,世界新闻记者公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大会,王侃叔因远东通讯社的关系,被接纳为会员,并作为中国代表到会。此外,王还介绍汪康年、朱淇、黄远生、陈景韩四人入会。此为中国报界最早参加世界性新闻组织的记录,也是中国新闻界走向世界的第一步。”^[2]对前人的相关叙述作出修正。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与随后出版的刘家林所著的《中国新闻通史》,对前人所持“上海日报公会为我国最早的报界团体”的观点提出质疑。前者明确指出:中国最早的新闻团体是《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于

[1] 马光仁:《我国早期的新闻界团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第4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63页。

[2] 王洪祥:《中国新闻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87页。

1906年7月在天津发起的“报馆俱乐部”。^[1]《中国新闻通史》也认为“天津报馆俱乐部是我国近代第一个新闻团体”。^[2]不过两说均未能提供较为有力的证据。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1850—1949）》进一步修正前人对上海日报公会的看法，称：“（上海）日报公会最早的活动见于1905年底，但组织并不健全，直到1909年才稍有改观。”^[3]陈伯海主编的《上海文化通史》一书，也指明上海日报公会的活动起于1905年底，正式成立于1909年。^[4]不过，两书在上海日报公会成立的时间、过程、影响等细节方面虽然较前详尽，共同的缺陷是没有提供经过验证的史料依据。

另有部分通史和史事长编性质的参考书在史料收集和考证方面用力甚勤。1991年，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一书，对武汉报界先后所组建的几个团体组织——汉口报界总发行所、汉口报界联合会、武汉报界公会分别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并对武汉报界的联合行动、武汉报界与全国报界联合会的关系有所论列，^[5]使后人对于辛亥前后武汉的报界团体的了解深入一步。但由于该书属于史料长编性质，不可能展开分析报界的团体及活动。199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其第二卷简要提及上海日报公会、中国报界俱进会、全国报界联合会的成立和组织概况，基本承袭前说。不过，该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453页。

[2] 刘家林：《中国新闻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13页。

[3]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63页。

[4] 陈伯海主编：《上海文化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463页。

[5] 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

书专辟一节,对五四运动中新闻界的表现有较为详细的考证,认为北京报界、上海日报公会、全国报界联合会都曾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全国新闻界在爱国的立场上结成了统一阵线。^[1]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于1999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一部全面而翔实的工具书和参考用书,比较详尽地叙述了天津报馆俱乐部、上海日报公会、中国报界俱进会、北京报界同志会、全国报界联合会等报界团体组织的成立与活动的部分史实,史料搜集非常丰富,在前人基础上有明显进展,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诸多线索。不过,受体例限制,该书除提供史实外,难以展开论述和分析。

近年,一些研究者在讨论报业、报人和报律等问题时,触及报界结社和团体活动以及报界群体的职业意识。1996年,中山大学王学珍撰有硕士论文《清末报律研究》,主题在于讨论清末报律的制定与实施,但对北京报界公会在报律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上书请愿活动的描述较为细致,并强调“报界团体的上书请愿比报馆刊载论说、漫画作用更为直接和有力,更能引起清政府的注意,促使民政部和资政院在制定与决议报律的过程中将其意见吸收参考采纳……报界团体在报律实施过程中,从维护报界权利出发,请求清政府依律办事”。^[2]桑兵《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一文,对报界同业群体的崛起过程及报界群体意识的产生和影响有所讨论。他指出,报界联合规模的不断扩大,显示了同业群体的崛起及其社会地位的上升,清末传媒与官府在一系列重大问

[1]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7页。

[2] 王学珍:《清末报律研究》(未刊),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题上发生尖锐冲突与激烈论战,形成全面对抗。^[1]宋晖2004年发表在《国际新闻界》的文章,通过揭示早期记者的职业认同危机、科举情结和文化认同危机,考察分析了早期记者的职业意识和精神状况及其对新闻工作的影响。她认为,早期记者产生于外人所办报馆,孕育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产生之初起就深受西方新闻观念影响;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记者正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职业意识和观念,同时又受传统文化影响,难以摆脱传统观念束缚,热衷科举,对西方文化表现出排斥心理。^[2]

此外,部分学者对近代社团的研究为本书讨论报界群体意识的自觉具有提示意义。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一书对各类新式社团组织的涌现与清末社会分工的细分化、社会关系重新分化组合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了深入分析,对清末群体意识、合群观念及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相互关系亦有独到见解。^[3]严昌洪《“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一文,借助于对国民公会的深入研究,分析了清末中国社会各阶层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强及社会结构的错动。^[4]

简要回顾相关学术史之后,不妨从整体上作几点估价:其一,前人对报界团体的研究为进一步探讨该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其二,已有的研究成果,因为对相关文献特别是报刊资料挖掘不

[1] 桑兵:《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22页。

[2] 宋晖:《早期记者的职业意识和精神危机》,《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5期。

[3] 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

[4] 严昌洪:《“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